

爱国华侨学者容闳(下)

——纪念容闳逝世七十周年

戴学稷 徐 如

四

自1882年至1895年,容闳侨居美国十余年。他的美籍夫人克洛于1886年5月因病逝世,留下两个男孩,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因而此后近十年间,容闳“以严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

在这十多年中,自中法战争(1883—1885)以后随着外国侵略者不断侵犯我边疆领土,民族危机渐趋严重。1894年又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形势更紧张。容闳虽身在几万里外的美国,但十分怀念苦难的祖国。他在爱国心的促使下,一连给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兼翻译的老朋友蔡锡勇发了两封信,提出应战的建议。建议之一是中国宜向英国借款一千五百万元购置铁甲舰,雇用外国军队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其二是将台湾抵押给西欧任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作为陆海军继续作战之军费。这两个建议反映了容闳对于西方列强存在着极大的幻想,根本没有认识到它们同日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以争夺中国这块大肥肉。当时蔡锡勇在湖广总督张之洞那里当幕僚,张之洞对容闳的第一个建议很感兴趣,立即发电报派容闳去伦敦借款一千五百万元。容闳到了伦敦,筹商借款已就绪,因以关税为抵押遭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李鸿章的反对而作罢。容闳返抵纽约,接到张之洞电促回国。于是容闳又从他侨居的美国回到离别了十三年的祖国。这一次是他第五次回国,也是最后一次回国,这时他已是六十七岁的老翁了。

1895年初夏,容闳返抵上海。他在自传中说:“予此次之回国,因恨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说明他爱国之心不已,并不因年老而有所衰减。这时张之洞由武汉调往南京代理刘坤一的两江总督,见面之后,容闳大失所望,张之洞并不想有什么作为,亦无重用容闳之意。当他返回湖广总督原任时,将容闳交给刘坤一当属员,在总督衙门

里挂了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空衔头，“而无一事可为”。三个月以后，容闳辞职去了上海。

1896年到1898年，容闳先后向清政府提出过两项建议。第一项是建议：“参仿美国银行章程”，设立国家银行^①；第二项是要求清政府“准美商筹资”四亿两，“帮同中国始终造成全境铁道，别国不得分夺利益”。^②前者经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的支持和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赞同，已进行具体筹办，以后因买办官僚盛宣怀的破坏而未办成；后者清政府未接受。容闳于一年后又提出新建议，要求清政府“准自设公司”，由他承办津镇铁路这一段。办法还是依靠招集洋股，即“借力于美”^③。容闳在他以后写的自传中也说：“予以极力欲成此事，遂拟以此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这里说的“外国”指的是美国，也就是说，还是“借美商之财力”来修筑，只是线路缩减为津镇这一条。当时正处于“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说“容闳乃请筑津镇铁路，吾实助之，奉旨久行”。但这个建议引起了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容闳“暗纠洋股”、“为虎傅翼”，认为“容系洋股，与德易于勾串”，甚至说：“此路成后，德之陆军长驱而北，一日直至永定门矣”。“一旦猝有变故，必如强占胶湾故智，防不胜防，战不胜战，避不及避，从此京师岂有安枕之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其实张之洞等是害怕津镇路在这时修建会妨碍他们正在兴工的芦汉铁路之进行，惟恐“容路在东可树一帜占尽路利，比款必至翻悔，不肯交银，则芦汉路必因此而废”，并且企望着将来芦汉路建成后他们还要“兼造东路”。^④但这时德国把山东当作它的禁脔，不愿意津镇路经过山东，特地声明它对山东享有特殊权利，不许任何人在山东通过铁路，清政府害怕引起国际交涉而作罢论。

容闳企图借助于美款在中国兴建铁路，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根本不认识自甲午战后在帝国主义加紧扩张对华侵略的争夺战中，攫取铁路的修筑权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美国在各国中的野心特大。当时美国合兴公司除参与对芦汉、粤汉两路提供借款的竞争外，还垂涎于投资建筑东北地区的铁路，以至于企图染指全中国铁路的权益。他们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进行活动并到处寻找代理人向他们效劳，而容闳正适应了他们的需要。由于容闳与美国有着长期的密切的关系，更由于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看不清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真面目而上了当。幸而事情未成，否则就会象张之洞指出的那样：“虽容闳本无他意，但关涉洋股，容闳将来亦不能自主”^⑤而必将损害中国的

①容闳《请创办银行章程》，《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三，《商政》。

②《录容观察上总督条陈》，载《闽省会报》（一八九六年）第一六七卷，二千三百五十七页。又见容闳《铁路条陈》，光绪二十二年，宣今室主人辑：《皇朝经世文新编》“铁路”第1卷8—9页。内容有所不同，后者提出由美商纠集公司，经办包括畿东、滇南、川广、芦汉、苏松、淞沪等各线，更为具体，当为前者之补充。

③容闳《津镇铁路条陈》，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于宝轩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第36卷，第13—14页。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N.121页。《鄂督张之洞致总署容闳请选津镇铁路必有洋款万不可允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江督刘坤一致总署容闳请选津镇铁路决不可准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页六至七，九至十页。

⑤前引张之洞折，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页六。

权益。有的同志认为容闳“甘愿为美国资本效劳”，①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主观愿望应该说还是如同他自己表明的那样，是为了“救助中国”；还有的同志认为，“容闳主张借洋债兴办企业或由帝国主义投资经营中国企业，“反映洋务企业的对外依赖性并迎合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②，我们姑且不谈容闳在他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时也算不了洋务派，仅从这时他因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生的计划遭受挫折而与洋务派已毫无关系达十七、八年之久这一点来看，他也根本代表不了洋务派，自然也就无从反映“洋务企业”的任何愿望了，而从容闳的基本思想和一生的表现来看，我们认为更难对他作出这样的论断的。固然，容闳由于长期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具有相当浓厚的崇洋思想，特别是盲目的崇美思想，他对美帝国主义同其他的帝国主义同样具有侵略的本性是认识不清的。例如他说，“即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自由行动乎”！同时，又认为“欧洲各强国甚且倡瓜分中国之议，幸美政府出而干涉，乃不得实行”，竟把帝国主义之所以没能瓜分中国归功于美国的“干涉”，归结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自然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我们绝不能因他认识上的这个局限而就此抹杀了他思想的主流，把他目之为洋务派以至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容闳的这些建议，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许多认识还是很正确的，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的立场和思想感情的。例如在前引1896年上总署的铁路条陈里，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前一年沙俄和法国对中国的一亿两借款是别有用心，认为从表面上看，他们好象是“爱我、助我”，而实标上是为了“图我”，“是宜远之防之”。他说：“俄、法，强大之国，高踞西北，有建瓴势，辄肯以百兆借于我，只请造西伯利亚铁路绕我满洲，具有深心。一旦窃发，将何抵御？此诚我心腹之忧”。把沙俄的侵略野心，看作是“心腹之忧”，这是继林则徐之后的颇为难得的有识之见，在当时能说得这样透彻和大胆也是很少有的。

容闳最后这次回国的几年间，随着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也逐步走向高潮。容闳是完全赞同这场变革的。本来，他在八十年代初年当他的教育救国的计划陷于夭折时，就曾深有感慨地认为：“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但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根本上之改革”，他并没有切实有效的方案。这次回国，在一连上了几个建议又都遭拒绝后，便又消沉起来，“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但是当1898年初夏光绪帝决意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开始变法维新时，容闳又趋向积极，“乃决意留居北京，以觐究竟”。他所谓的“以觐究竟”并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热情投身于维新人士的集会活动，他对于光绪帝的期待与崇拜，并不亚于康有为等人，认为光绪帝“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称许光绪帝是“爱国之君”，“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和“伟人”，是“中国革新之先导”。在“百日维新”的这几个月里，容

①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② 王永康《容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吗？》，见上海《文汇报》1963年4月4日第4版。

閔的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他拥护变法维新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热烈而积极，他在京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当时，变法运动的主要策动者康、梁、谭及一些赞同维新的京官以至于帝党主要人物翁同和，都很器重他的学识，支持他借外资筑铁路的建议，与他交往频繁。^①在顽固派发动政变前夕的风声鹤唳之际，容闳曾想请求美国驻华公使出来解救，康有为“以其无兵，无济于事，却之。”^②政变发生时，容闳自己被“撤差”，他却不计个人安危函请李提摩太营救梁启超。^③此后，康有为逃离北京在给李提摩太的密信里还特地附有另函致容闳，要李提摩太“代妥密交”，并将所有各种情况都告诉容闳。^④由此可见容闳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作用及其与康、梁等维新派的密切关系。由于这些情况，他在政变后不得不逃亡上海，“托迹于租界中”。

尽管变法运动失败了，但容闳却没有因此而灰心。这时他已年逾古稀，然而却越发成为维新运动的积极分子。由于他的进步表现，加上他过去的资历，使他在维新派和爱国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到1900年7月“康梁余党”、谭嗣同的亲密战友唐才常于秘密筹划“自立军”起义的同时，在上海以“自立会”为核心筹组“中国议会”或称“中国国会”，他和严复分别被拥为正、副会长。孙宝瑄的《日益斋日记》具体而生动地描写了当日会议的情景：——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公元1900年7月26日），是日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北向，（叶）浩吾（叶瀚）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⑤（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中国议会在愚园召集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上，唐才常、郑观应（未到会）、汪康年等十人被推任干事。唐才常自任总干事，为自立军起义进行舆论准备。当时“自立会”推容闳任外交事务，起草英文对外宣言，严复译为汉文，表示反对顽固派利用义和团“排外”，宣告“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但却又宣称“端在复起光绪帝”，《宣言》还表明要“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与之人民”，并对租界、教堂以及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力为保护”等。^⑥这个宣言和它的前身“正气会”的章程相一致，既反对清政府的统治，进行起义，又要光绪复辟，除了反映唐才常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外，也基本上反映了容闳自己的思想状况。容闳当时并不认为：

①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62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Ⅳ、第121、142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Ⅳ 285页）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Ⅳ 161—162页。

③程潜：康南海先生墨迹跋，《戊戌变法》Ⅰ、第421页。

④《戊戌与李提摩太书及癸亥跋后》，《康有为政论集》下册，1086页。

⑤《日益斋日记》（稿本），转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卷九，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再版第130—131页；并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六九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⑥《日益斋日记》，见同上书第131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章太炎《民国光复》，《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40页。

必须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国。

参加自立会上海集会的章炳麟，虽然不赞同自立会的保皇宗旨，但他对容闳却是十分推崇的。这年的8月（农历七月），他在致陈少白的一封信中说：“友人乃立中国议会于上海，推〔容纯甫〕君为会长，〔容〕君天资伉爽，毫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①由此可见容闳在当时国内智识界中的声誉与影响了。

1900年8月下旬，“自立军”“讨贼勤皇”的起义计划泄露，唐才常等被张之洞拿杀，容闳在上海也无法藏身，于9月1日化装易名乘轮离沪赴日，十多天后又由日本转香港。

容闳在这次由沪赴日途中，很凑巧在船上遇到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刚由日本抵沪，因自立军起义失败，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在上海难以开展活动而又折回日本。这是容、孙的初次会面。在这以前，容闳就很盼望会见孙中山，曾向旅居香港组织“辅仁文社”的澳洲爱国华侨谢纘泰打听孙的情况。②通过这次会见，他对孙中山有了很深的印象，认为“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孙中山，③而孙中山也认为容闳是“声望素著，富新思想”，热心于改革中国的老前辈。船抵横滨后，二人一同上岸“在旅社闭户密谈甚久”，以后又同去了一趟东京，在犬养毅宅与宫崎滔天、内田良平等会谈。④

事实是最好的教育。经过戊戌政变、上海自立会活动、自立军起义失败和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役等一系列事件，使容闳的思想开始有了质的变化，他已由赞助维新变法进而同情革命，对于清政府已经不抱很大的幻想了。但也必须看到：容闳这时也还没有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截然划清界线。

1900年9月中旬，容闳由日本乘轮抵达香港。此后两年多时间里，谢纘泰和他的父亲谢日昌以及李纪堂、洪全福等在香港正在酝酿、筹划发动一次夺取广州的起义活动，准备在建立临时政府后，拥容闳为总统。这个时期的前段时期容闳虽在香港，他在精神上是支持这次起义的，但从谢纘泰的记载中看来，容闳并没有参加他们的实际活动。⑤在香港逗留期间，容闳时时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要求青年人“日日有‘我为中国人’之心，即日日应办‘中国人之事’，勿为大言，只求实际”。他从义和团运动看到中国的

①《中国旬报》拾九期附刊“鼓吹录”，“论说”栏：来书（庚子年七月十五日即1900年8月9日出版）。原文受信人及〔 〕内均空缺，以〇〇及〇〇〇等替代，今按信中词意推断。

②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所记1900年3—4月容闳到香港与谢纘泰、杨衢云密谈政治局势问题。容闳这次是为何和如何去港的详况不明。

③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115页。所记时间有误，惟所谈对孙中山的印象当为1900年9月赴日途中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后所得的印象。

④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杂纂》（支那）“革命党关系”卷一，转引自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三三〇页；〔日〕近藤秀树编、禹昌夏译《宫崎滔天年谱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132页。

⑤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12—317页。

希望，认为义和团运动反映了中国的“民气”。他说，“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当然他还把义和团看成是“下层愚民”，但他认为通过义和团运动，表明中国的“民气已动”，且“将及于士大夫”，则是很难得的认识。他并以美国的独立战争为例，肯定义和团对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正义的反抗，勉励青年人说，“东亚主人，终在中国，汝等年少，好为之！”^①这位奋斗了几十年的爱国老人，对年轻一代寄托了无限的希望，谆谆再三告诫青年人要为振兴中国而奋起，这种爱国的真诚情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

这时，容闳在香港，清政府和张之洞等因他支持维新变法，参与自立会活动，还在到处通缉他。1901年春，他曾到台湾去游历，当时的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就曾告诉他，清政府闽浙总督有公文来要求在他到台时捕送中国。台湾如此，香港同样也并不安全，他不能长期滞留在那里。这时的容闳既不能回归祖国，而美国政府于1898年起即不承认他的美国国籍。^②尽管如此，他感到还是到美国去好，那里不但是他曾经侨居多年的地方，有他的两个儿子和许多朋友，而且还有比香港有利的条件，可以做一些“维新中国”的事。

1902年5月16日，容闳自香港启程东航，6月12日抵旧金山，6月18日到达哈特福德城，并定居在那里。

五

1902年至1912年，容闳在美国度过他一生的最后十年。

这已是容闳第六次登上新大陆。由于年事已高，他这次到美国后开始过着退休式的生活，除访友外，主要是撰写回忆录，用英文写他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但他并未停止关心祖国的活动，这位爱国老人，虽然已到了垂暮之年，但他的赤子之心，无时或已，时时都还眷恋着大洋彼岸的祖国。他与康、梁以及谢纘泰、孙中山都有联系。特别是与谢纘泰的关系更密切，彼此讨论着关于“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中国的问题。^③1903年，梁启超自日本游历新大陆，曾特地去拜访容闳。当时容闳已七十六岁，“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他与梁启超交谈“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④1905年康有为到美国也曾去拜访他。直到1908年以前，容闳一直支持着康、梁的活动，希望联合这个“维新党”。按容闳的愿望是想把康、梁和孙中山以及谢纘泰等所有力量都联合一起，并答应谢纘泰“提示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的要

①刘禹生《世载堂杂忆》，114—115页。

②《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三三〇页。

③《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15页。

④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求。容闳结识了同情中国实行变革的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 (Homer Lea) 和财界人士查尔斯·布思 (Charles B. Boothe), 支持荷马李和布思为康、梁在美国组织一支维新军 (亦称保皇军), 帮助康梁筹款等活动。但从1908年起, 他开始对康有为有所不满。这一年7月14日, 他在给谢纘泰的信中, 在建议维新党联合起来的同时, 谴责了康有为及其保皇会。1909年, 他在书信中及与美国友人交谈时已认为康有为“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 到了1910年, 他更是“强烈抨击康有为及其信徒”。^①这些情况表明容闳通过多年与康、梁的交往, 逐步认识了他们这一派人的政治面目, 不愿与保皇会这样的“维新党”联合了。容闳对康、梁的不满与决裂, 绝非个人的意气之争, 而是认识到在拯救中国这个问题上, 对他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

与此同时, 容闳日益积极拥护革命派的主张, 与孙中山的关系渐趋密切。1908年12月4日, 容闳曾函促荷马李采取武装起义行动支持中国革命, 表示如能取得一省, 即任命为总督, 并抄附中国各秘密会社名单, 包括革命党孙中山, 希望他支持孙中山等革命派。^②1909年5月中旬以前, 孙中山旅居新加坡, 容闳与孙中山通信频繁。这一年11月, 孙中山从欧洲到美国, 12月22日应容闳之邀到纽约与容闳会面。这是容、孙继1900年9月由中国到日本途中不期而遇后的第二次会面, 前后相距达九年之久。这时容闳正与荷马李和布思拟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 China), 准备募集巨款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 成功后给以一定的权益作报酬。1910年2月, 容闳致函孙中山正式提出这项设想和进行步骤, 并介绍孙中山与在洛杉矶的布思、荷马李商谈。此后便有1910年3月上半月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在洛杉矶长滩旅馆 (Long Beach Hotel) 的多次会谈。会谈结果双方议定: 暂行中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 集中力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由孙中山任命布思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 发给委任状, 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商洽贷款三百五十万美元; 由荷马李训练一批军官, 以帮助中国革命党人推翻清朝; 革命成功后, 美国债权人享有在华开矿、办实业等特权; 筹组临时政府等等。^③会后, 3月17日, 孙中山即函告容闳关于这个会议的商谈结果。^④其中孙中山特别注重的是筹集一笔发动大规模起义的资金。但布思、荷马李等拟募集的款项始终未成, 孙中山对此殊感失望, 因而容闳等的《红龙计划》和孙中山与布思等议定的条件也就没有实现。

以上的情况表明: 容闳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 终于认识到康梁保皇党不是真正为了中国, 也不可能救中国, 而断定中国只有走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路, 才有希望。他

^①《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0页;《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三三二页。

^②《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1975年版第425页;《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三三二页。孙中山认识荷马李并开始有较密切交往当在此以后, 现发现孙中山致荷马李的信件最早的是1910年2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440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448页, 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103、106—107页;《民国百人传》第一册, 第三三二页。

^④《孙中山年谱》, 中华书局107页。

支持孙中山不是偶然的，虽然这个转变时间拖得较长，然而最终还是完成了这可贵的质变。长期以来，容闳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而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他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的。容闳之所以能由改良者而成为革命者，起支配作用的是：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必须指出的是：容闳虽然热心为国，然而上述他提出的一些计划和办法却是很不现实的。中国的革命固然需要国际友人的同情与支持，但主要应该依靠中国人民去努力奋斗而取得。依靠外国人组织武装起义队伍和募捐巨款来支援中国革命而且以政治的权益作为交换条件是不可取的。孙中山也与容闳具有同样的主张，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个具体表现。

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和全国各省的热烈响应，消息传来，容闳是极为高兴的。当年12月19日，他在给谢纘泰信的附件里致这次斗争的领导者的信中这样写道：

“上天呼唤你们来领导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它已经在短短的期间内，使满清政府不得不跪地求饶。

“一方面，你们一直为遭受压迫和抑制将近三百年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着想，呼求一个共和国，给他们自由和独立，以作慰借。现在你们已经把这些满洲人推翻，不管那些政治骑墙派的言辞可能多么漂亮，好象多么有理，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标。……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他们这一套。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断定，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他是最受外国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直到把卑鄙的大烟鬼庆亲王的总理职位拿到手之后，他的那条跛腿立即变好了，他能够动来动去，想要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

“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齐撵走。……

“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声音，他们就对了。……”

这是一封多么有内容有文采的书信啊！在那感人的词句中表现了容闳对祖国命运的无比关切。他已经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坚定支持者，要求革命的领导者务必坚持“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标”，不要为阴谋家袁世凯之流所欺骗。他对袁世凯的刻画可说是入木三分。这是个很及时的告诫，可是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却无视于这个忠告而上了袁世凯的当，把政权完完全全交给了他。当然，这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必然结果。

与这附件同时发出给谢纘泰的信中，他还担心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后的干涉、控制新政权而使旧政权复辟。信里写道：——

“目前使我焦虑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

①《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4—325页。

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那简直就如同满清政权重新执政一样糟糕”。

他强调“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与妥协，以后事态的发展竟完全象容闳所焦虑的那样不幸而言中了。民国成立后的中国比清末时期还要糟糕。“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买办政权支配了中国，中国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进一步陷下去了。

在这封信中，容闳还提了一点建议，那就是：“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他以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掠夺成性的”欧洲列强。表现了他对美国政府的天真幻觉和太大的偏颇，这同他以前的认识是一致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容闳于12月29日又写信给谢纘泰，通过谢向孙中山致贺，希望谢纘泰等孙中山就任新总统职务时向他报导孙就职典礼的情况并给他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要谢“千万替我向他（孙中山）致以衷心的庆贺”。此外还特地要谢纘泰转告孙中山：“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这个新共和国”。他对祖国的新生怀着炽热的爱，寄予极大的希望。他认为孙中山和这些共和国的缔造人：“他们的名字铭记于人们的心中，应当受到人们的纪念”。

容闳的这些祝愿不知是否转达到孙中山那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1912年春，孙中山特地向容闳发出邀请信。希望容闳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孙中山怀着对老战友的热烈感情写道：

“丁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抱之目的将达之际，遥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而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亡异城，同病相怜，非仅为先生己也，即仆亦尝饱受此苦。乃今差幸……汉族之锦绣河山，得重见于光天化日之下，……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①

但是，这时容闳已因中风不能行动，在他病危弥留时还收到孙中山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可是容闳却已昏迷不醒，以致于连回信也不能写了。1912年4月21日，这位可敬的爱国主义战士终于闭上自己的眼睛与世间永别了。终年八十四岁。第二天他所在地的《哈城日报》（The Hartford Courant）在报导中称他是“学者、政治家和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说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注视，因为他毕生曾努力

^①孙中山《邀容闳归国函》（民国元年），《国父全集》，（台北1974年再版）第二册，玖—183页。

于此目的”。①他的战友和同志谢缵泰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后写道：“容闳博士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深深热爱祖国，晚年切望回国，为祖国效劳”。②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容闳由于晚年自己不能如愿回国，临终前特叮嘱他两个在美国生长的儿子回国服务，以偿还他为“新生的中华民国”服务的殷切心愿。他的族侄孙容麟学（联芳）记叙道：“公易簪时，犹嘱其二子颢彤、颢槐弃所业回助祖国。二子良不愿，缘当时均有优异之职业，月俸甚厚。公责之曰：‘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惟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二子逼于正义，乃从父命归祖国。故至今二人仍在国内服务云。”③

种种事实表明，容闳深深地热爱祖国。“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伟大的历史。”④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至死不衰。他晚年被迫流亡异域，虽在病中，还惦念着心爱的故国，盼望着他的健康状况好转能再回到中国来。正是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支持着他立志为“改革和复兴中国”而奋斗了一辈子，他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前进了大半生，历尽艰辛挫折，终于由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为一个共和国的热烈拥护者，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 × × ×

容闳生于鸦片战争之前十二年，死于民国成立之当年，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他生活的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威胁，中国人民正陷于愈来愈严重的灾难之中。落后的备遭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先进发达的自由独立的资本主义美国，鲜明而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使这个青年留学生受到刺激而深感痛苦，他立志改变中国的现状，企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是他对祖国有深厚的思想感情的体现，在共产党出世以前的旧中国，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和值得赞扬的呵！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这种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这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阶段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深重的民族灾难熬炼下，越发激励而放射出它异样的光彩。正如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指出的那样：“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

①转引自钟叔河《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见《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页。

②《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30页。

③《容氏谱牒》，1929年重修，排印本，卷十五，页二十四。容颢彤，族名咏兰，西名Morrison Brown yung，回国后任矿冶工程师多年，1934年死于北京。妻吴氏，早逝，续娶杨氏，遗有一子。容颢槐，族名嘉兰，西名Bartlett Golden yung回国后曾任广东省制造局（兵工厂）总工程师兼经理，也终于国内，娶妻邱氏，生有一女一子。他们的后人现均不在国内。现在国内之容闳嫡传后代有容妻郑氏所生之容申的子孙后裔。

④这是容闳的美国友人特韦契耳（Joseph H. Twichell）牧师在1878年对容闳的评论。转引自《西学东渐记·代跋》，张叔方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也如同不久前《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的：“完全应当这样说，一部中国近代现代革命运动史，同时也就是一部近代现代的爱国运动史”，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了强大的斗争力量，而且表现了强大的进步力量”^①。从容闳的一生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贯串和体现。他的事迹到今天对于我们仍然起着鼓舞和激励的作用，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和教育。

容闳在一百多年前远涉重洋，到美国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对所谓的“新学”产生了极大的信心，认为有这些东西就可以救中国。以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于是他企图把从美国学到的那一套东西，全搬到中国来，“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提出了他的“教育计划”。这个计划失败了，原因何在呢？他不明白。他不懂得“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道理，也不懂得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要想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求得国家的富强，只能是美好的空想。他的梦破灭了，然后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又失败了，最后才懂得了必须革命——推翻反动卖国的清朝政府，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团结，一切改革才会有希望。他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实践斗争中不断改正错误，因此他能顺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地前进。

容闳在他八十多年的生涯里，有四十个春秋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早年就加入美国籍，四十多岁时和一个美国女子结婚，他们生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教育长大的，他与美国的关系如此之深，然而他至死心还是向着中国——他的祖国。祖国，对他有着最强大的吸引力，什么障碍也阻挡不住。他深受欧美资产阶级西方文明的熏陶，然而却始终不忘东方这个古老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务必要使之进步发达，“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三次经印度洋远渡大西洋，八次横贯太平洋，一生风尘仆仆，为了祖国和理想，迢迢几十万里，到了晚年，又被迫两次逃亡，最后被通缉流落外邦。这些经历反映了他热爱祖国思想是那么强烈和持久。作为一个华侨学者，他更是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的。称他为卓越的爱国华侨学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容闳逝世已整整七十周年。在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普遍发扬的今天，我们怀着愉快而兴奋的心情，缅怀这位爱国的前辈。今天的中国，正是亿万人民奋发图强、意气风发的伟大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凌辱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再也不是容闳看到的“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的那种悲惨的境况了。当然，中国还很落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都还很很发达，在过去若干年里，由于错误和挫折所造成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是有志气有能力的，他们一定会无愧于前人。十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一定要振华中华，也一定能振兴中华的！

1981年孟夏初稿

1982年新春修订

^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人民日报》1981年8月19日第一版。